

晚明经济变迁带来的士大夫文化转向

王源浩，胡宜

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00

DOI: 10.61369/SSSD.2026060036

摘 要： 本文聚焦晚明经济变局下的士大夫文化转向，指出明朝以恢复汉家儒家文化为核心，而晚明商品经济发展与制度松动引发了文化领域的重大变革。正德后，活字印刷推动出版业商业化，催生了以售文、编书为生的“山人”群体，打破了士大夫对功名的单一依附。阳明心学的兴起否定了程朱理学对人欲的压制，催生类似西方人文主义的个人主义思潮，文学创作也从颂扬礼教转向关注个体命运与批判僵化秩序。这一转变还体现为士大夫云游之风复兴、尚侠尚武精神回归，以及女山人的出现，后者标志着女性在商业与文化领域获得有限解放。晚明士大夫文化转向呈现出向初唐开放包容靠拢的特征，与西方近代化进程遥相呼应，虽因满清入关而中断，却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关注个体生命的韧性，是中国早期近代化的重要文化表征。

关 键 词： 晚明经济；山人群体；士大夫文化

The Cultural Shift of the Scholar-Officials Brought About by Economic Change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Wang Yuanhao, Hu Yi

School of Humanities,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Jiangxi 330000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ultural shift of scholar-officials under the economic change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pointing out that the Ming Dynasty centered on restoring Han Confucian culture, 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odity economy and the loosening of system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riggered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cultural field. After the Zhengde reign, movable type printing promoted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giving rise to a group of "mountain people" who made a living by selling books and compiling books, and breaking the single dependence of scholars and officials on fame and fortune. The rise of Wang Yangming's School of Thought negated the suppression of human desires by Cheng-Zhu Neo-Confucianism, giving rise to an individualistic trend similar to Western humanism. Literary creation also shifted from praising rites and teachings to focusing on individual destinies and criticizing rigid order. This transformation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revival of the trend of scholars and officials traveling, the return of the spirit of chivalry and martial prowes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female mountain people, the latter of whom marked the limited liberation of women in the commercial and cultural fields. The cultural shift of the scholarofficial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showed a feature of moving closer to the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 which echoed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the West. Although it was interrupted by the Manchu's entry into the Pass, it demonstrated the resili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focusing on individual life and was an important cultural manifestation of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Keyword: the economy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group of mountain people; scholar-official culture

明朝作为一个力主恢复汉文化的王朝，其社会以及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尽可能去除外族文化带来的文化动荡，以及重新建立汉唐宋以来的儒家文化主导的汉民族文化，这也是整个明朝士大夫文化的重要特征^[1]。但随着晚明经济的变局与经济改革的变化，晚明的士大夫文化开始出现了内在的精神转向。这一转变也象征了士大夫阶层在晚明社会格局当中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可以说是千百年来的中华文明史上少有的自由开放。这种转变它既是对汉唐以来的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也是对僵化的礼教的一种叛逆。实际上，我们可以从这一变化当中看出，在这一段历史时期上，中西方的近代化进程正在遥相呼应。

一、正德以来的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个人主义思潮

正德时期是明朝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政治的重大分水岭，

随着社会的变化，新的经济因素渐趋产生，社会、思想乃至文化开始由明初的保守、沉闷、逐渐趋向革新、活跃。明初的文化在正德之后呈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面貌^[2]。

作者简介：王源浩（2000.6—），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社会学。

从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一直到正德时期，明初的社会呈现出一段非常保守的文化特征。朱元璋立国的基本方针，就是让明朝统治下的子民能在农耕社会中重新安居乐业，重新建立起自汉唐以来的汉民族的农耕文化。尽管朱元璋并不能从个人、从统治者的身份去去除历史变化进程上新添加的各个社会群体，但是他尽可能地在保护汉家文化的立场上，保护传统的四民（士农工商）的合法利益，但同时限制他们在地域空间上的流通。强迫他们必须待在地方，不能因事四处远游。因此，整个明初社会呈现出一片保守的面貌，且由于汉家文化的恢复和统一的汉族王朝的重新建立，社会对于传统文化处于十分尊敬的态度中，思想处于一种统一的风气下。我们可以从明初的文学看出，这种统一的思想使得士大夫阶级的文化也处于一潭死水的风貌，相比元代甚至有退步之风。这并非是一种文学退步的意味，而是思想的统一使得许多的社会问题可以在一种统一的价值体系中得到阐释，并不需要文学创作来进行新的视角解读。因此明初的士大夫文化主要以评鉴古汉家文化诗词赋，高歌颂德明王朝建立为主。

正德时期以来，明朝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导致了城市的集中发展，城市生活日趋繁华。而导致这一生活繁荣的最大经济因素，就是出版业的商业化。活字印刷的技术出现，大大改良了出版文字的篇幅、速度以及方式。在过去印刷不方便的情况下，往往必须是非常经典的，官方允许的典籍，才可以印刷流通。而活字印刷的出现，大大改变了这一现象，使得惜字如金的中华文化也开始产生了大篇幅的小说记录，小说这一形式也从这样的技术变化当中兴起兴盛。小说的出现，使得文字记录不再局限于帝王将相的历史阐述，他也开始关注于老百姓的生活需要，这也正是他的商业特征。而这种商业的需要，也使得许多士大夫文人嗅到了商机，又或是找到了一条不需要依靠朝廷的谋生之路，由此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文人阶层——山人。山人文化群体的出现是晚明士大夫文化转向的一种外在呈现，这一群体的出现也大大加速了各种思潮在文人内部的传播和流通速度。

另一个思想上的重大转变，就是阳明心学的建立。程朱理学对于社会秩序的巨大控制，就来自于它对于欲望的规训，否认欲望在个体身上的合理性，认为这一私欲就是混乱之源。强调一种机械的，固化的阶级、家庭与性别的伦理秩序^[3]。而王阳明则从多个角度，否定了这一机械看法的僵化性，王阳明认为私欲在人身存在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由此人应该向内探求求圣之道，而并非单单向外探求一种制度的建立。王阳明也许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一龙场悟道的思想转变，造成了社会文化的历史性的变化，他将过度追求外化规训的儒皮法骨的理学文化，转向了追求个性自由的，个人主义文化。而这一文化上的转变，马上就在山人群体内迅速传播，由此形成了一股类似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个人主义思潮。

这一特征我们可以在文学上的变化找出。比如同样写有潘金莲故事的明初的水浒传对比晚明的金瓶梅。同样的故事，水浒传则专注于武松复仇的正义性和英雄主义的叙事，实际上是重新强调了理学秩序和礼教对规训性别秩序的重要性。而金瓶梅却重点完全不同，他更偏向于西门庆和潘金莲的视角，使得读者对对立

的双方都产生了一种悲悯，从而侧面抨击了抑制人爱欲的礼教的罪恶性，这种罪恶就是导致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而非完全归因于一种个人的道德沉沦。这种个人主义的兴起，使得汉族文化向着一种新的方向开始发展^[4]。

二、山人群体的兴起

山人并不是明朝所特有的产物，他原本只是归隐的儒士的一种自称，由于陶渊明对于归隐于南山的美好文学描绘，士大夫文化往往对归隐山林有一种朦胧的向往。但至少在明朝之前，这种向往很多时候有一种文人的酸臭气的意味在里面，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官职，便说自己向往山林，实际上离开朝廷的俸禄，这些士大夫往往不能在社会上生存，更不用说荒野求生。但出版业的商业化，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文人不一定非要考取功名才能将学识转化为经济利益，从事文艺出版，也可以将自己的学识转变为财富，甚至这种财富要比官职的俸禄要多。因此，大量的在野的知识分子出现了，他们不追求考取功名，而是一种商业上的成功，他们为了一种雅名，便称自己为山人，一个沉浮于商海的隐士，颇有讽刺与玩乐的意味。

大量底层知识阶层借“山人”身份活跃于社会的各个层面，是明代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与文化现象^[5]。这个群体初兴于弘治年间，在嘉靖朝发展壮大，至万历朝大盛。他们精于诗文、博览博观，以干谒、售文、设馆、入幕等方式为生计，而能让他们摆脱对权贵的依附、掌握话语权的重要手段正是参与出版活动。嘉靖以降，有30余位知名山人涉足出版业，负有盛名者除陈继儒外，还有徐渭、屠隆、王稚登、梅鼎祚、黄省曾、俞安期等人。山人从事出版业，主要是负责编书、校书、刻书、抄书与推广书籍等工作，仅就前三项统计，流传至今的作品就达百余种。山人是深受心学洗礼与社会经济发展新动向影响，在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上均发生重大转变的另类文人。

由此可见，晚明的士大夫阶层也高度参与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当中，并且从而改变了自身的文化特征。山人群体的出现，带动了晚明士大夫文化的几个重大转变^[6]。其一是云游，云游的这一传统我们可以在唐朝的文人习俗中看到，唐代诗人杜甫的许多登高之作就是在三十岁之前云游而作，唐时文人有一种风俗，就是在三十岁之前可以云游四方，再考取功名。这种风俗其实带有很重的阶级特征，由于唐朝科举制度刚刚建立，实际上把控官场的大部分官员仍属于门阀大族，这种云游实属于一种阶级特权。而且唐朝科举实行双轨制，不一定非要通过考试来当官，也可以通过推荐的形式当官。而在科举日益完善的宋明，这种云游对于考试制度下的考生来说不亚于天方夜谭，同时明初强硬的户籍制度也阻止了这种云游现象的发生。

但随着晚明制度的松动，商品经济的兴起，山人通过出版业争取了大量钱财，获得了这种旅游的经济基础^[7]。再加上制度上，王朝对商人阶级的诸多限制，使得山人并不能享受如今市场经济下商业上的完全自由，云游就成了他们花销钱财的一个去处。既可以满足社会交往，扩大自己的文人社交圈，还可以在自然中远

离权贵对他们的控制与骚扰。晚明士大夫中爱好云游的典型就是大名鼎鼎的徐霞客^[8]。

其二就是尚侠尚武。对于尚侠的文人，我们通常会想到李白，他不仅是诗人，也是剑客——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李白的侠客行正是唐朝游侠之风的代表之作。晚明的文人虽在客观的社会管制上无法像李白那样四处杀恶，但是他们在反对理学控制的层面上，往往向往这种自由的生活。因此晚明的文人多以崇拜为主，他们将儒学与侠盗的劫富济贫的行为相结合，极大发展了儒家中的“义”的概念。他们多喜爱于侠盗之士结交朋友，甚至在经济上协助这些侠盗。客观上，反应了晚明社会管制的极大松动，士大夫文人对日益僵化腐朽的王朝的失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晚明的文人反对宋以来的理学，由此他们的文化特征也向着宋以前的初唐文风靠拢，但由于存在着诸多社会限制，他们形成了一种类似初唐，但却独特自洽的文化氛围^[9]。

三、女山人的出现

晚明山人群体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那就是女山人的出现。女性在理学下的管控与规训相较于男性更为严重，因为她们还要服从于一种性别秩序。但是这并不代表女性在古代就是完全愚昧无知的被动姿态，作为智人，女性与男性一样，也会有对于社会的思考，对于人生的追求，但这些都以一种被社会压制的形态而出现。因此，我们需要辩证看待晚明所谓淫乱小说的出现以及对金瓶梅的污名化，性欲望管制上的松动，正是晚明女性挣脱礼教的一种控制。三言二拍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这一话题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到，在晚明时期，冯梦龙的小说中的女性都是以一种感性的，智慧的形象出现，比如最经典的杜十娘的形象，一个足智多谋，敢爱敢恨，风情万种的知识女性，在社会中却只有妓女这一位置留给他，而她的解脱之道只有依靠男人赎身。这一故事不仅抨击了礼教的性别控制，还体现了作者本人，冯梦龙的观念特征。冯梦龙这样的男性作者，在晚明也十分注重感情，并且认为感情在人类生活中是十分重要的，并且会站在女性视角上去看问题。我们要知道，三言二拍在当时属于商业内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脱口秀，如果只有冯梦龙一个人是这么思考的，他完全不可能找到他作品的观众，更别提取得当时商业上的成功。因

此，三言二拍的观念，恰好反应了晚明使命社会的一种变化特征，也更是士大夫文人的一种情感诉求，那就是同情礼教控制下的女性。

在这一意义上，山人群体对于女性的接纳，也就不奇怪了。

商品经济发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逻辑，就是需求。而作为社会中占据一半人口的女性，她们的需求也是一个天大的商机，但是古代的女性在嫁人后经济是被男性控制的，那怎么办呢？从宋代开始，就催生了这么一种专门解决女性需求的女性商人，他们统称为三姑六婆。由于女性在经济上和人身自由上受到控制，因此针对女性的商品交易要有一个可以出入男主人宅邸而不被人说闲话，同时知晓女性需求的人，那么三姑六婆就很好的符合这一特征。而到了晚明之后，三姑六婆其实从事的更多是皮条生意，即勾引别人老婆去和买家发生关系，因为女性在礼教下被压抑最深的需求就是性需求，我们可以从潘金莲的故事，以及三言二拍中王巧儿的故事看出，如果不是这些三姑六婆，女性在旧社会中没法光明正大出入其他男性宅邸。因此三姑六婆一直不管在文学上还是社会上，都是十分讨人厌恶的角色。而这样的需求很显然，不能成为一个正当的，社会主流所允许的从商路径。但出版业的商业化，改变了这一局面。它给予了女性从商的一种正规的路径，同时山人群体对于有才华的知识女性更为包容，这层身份能够给予她们一定的社会庇护。

四、总结

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出版技术的更新，导致了晚明士大夫阶层重大的文化变化。他们从明初的崇尚传统，崇尚理学的统一思想，开始转变为抵制礼教，崇尚心学，崇尚个人主义，追求商业成功的文化氛围。同时这一改变使得文化开始迅速向着初唐的开放包容靠拢，与西方此时正在进行的人文主义思潮遥相呼应，是中国社会变化巨变的前兆。只可惜这一进程被满清入关所打断，中国的政治走向了更加集中化的极端，反身对商品经济的继续发展产生了极强的压制。因此晚明的文化繁荣总归是昙花一现，但这种昙花一现也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民族文化，他代表着我们的民族文化不仅有了秩序的一面，也有了关注个体生命的一面。这就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韧性所在。

参考文献

- [1] 蔡燕梅. 明末山人尺牍集的编刊及其文献价值 [J]. 印刷文化 (中英文), 2024, (03): 99-120.
- [2] 张俊福. 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之民俗性研究 [D]. 兰州大学, 2022.
- [3] 云玉杰. 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中佳人形象研究 [D].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
- [4] 朱建磊. 晚明社会文化变迁与政治秩序的互动 [J]. 青海社会科学, 2019, (06): 226-231.
- [5] 吴琼. 明末清初的文学嬗变 [D]. 上海师范大学, 2012.
- [6] 廖丹琪. 从“三言二拍”看晚明社会的变迁 [J]. 全国商情 (理论研究), 2010, (03): 138-140.
- [7] 张显清. 晚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 [J]. 河北学刊, 2008, (01): 63-67+75.
- [8] 胡海义. 明末清初“西湖小说”研究 [D]. 暨南大学, 2006.
- [9] 冯玉荣. 明末清初松江士人与地方社会 [D]. 复旦大学, 2005.